

美国大学体育的历史沿革及阶段性特征

边宇¹, 刘明¹, 吕红芳²

(1.华南理工大学 体育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1; 2.许昌学院 体育学院, 河南 许昌 461000)

摘要:通过对美国体育史文献的归纳、分析与整理,认为美国大学体育的历史沿革可分为形成、本土化和多元化3个阶段。形成阶段的特征是科学化、多样化和去宗教化;本土化阶段的特征是“美国化”根本诉求、系统化的哲学基础和体育竞赛的法制化;多元化阶段的特征是反复化和政府化。美国大学体育历史沿革的动力来源是体育思想的转变,阶段性特征的整体趋势是从工具价值到本体价值的演进。

关键词:学校体育;大学体育;美国

中图分类号: G807.4; K7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13)03-0081-04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stage-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IAN Yu¹, LIU Ming¹, Lü Hong-fang²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 China;

2.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Xuchang University, Xuchang 461000, China)

Abstract: By generalizing, analyzing and systemizing literature data about the history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uthors concluded that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namely, formation stage, localization stage and diversification stag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rmation stage were scientized, diversified, and de-religion;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localization stage was the legalization of “Americanized” fundamental appeals, systemize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and sports competition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versification stage were repeated and government dominated. The source of power for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the changing of physical education ideology; the overall trend of stage-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was the evolution from instrumental values to ontological values.

Key word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USA

美国大学体育一直是我国学校体育研究的关注点,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美国大学体育的课程设置、管理模式等实践层面,鲜有历史沿革方面的研究成果。只有系统梳理美国大学体育的历史脉络及其阶段性特征,才能真正把握美国大学体育的本质,为我们相关学习和借鉴提供前提与基础。

1 美国大学体育形成阶段(1861—1889年)

1.1 美国大学体育体系的形成

首先是公共体育体系的形成。1861年,希区柯克

(Edward Hitchcock)在马萨诸塞州的阿姆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 MA)创建了第1个大学体育部并开设了全美第1个有组织的大学公共体育课程,标志着组织化、体系化美国大学体育体系的形成^{[1]376-377}。由此,美国大学公共体育的组织机构管理、课程设置、教学实施与体质健康测评逐渐建立起来。

其次是体育专业教育体系的形成。组织化大学公共体育课程出现的同年,美国第1个体育师资培训机构——体育师范学校由路易斯(Dio Lewis)在波士顿创建,标志着美国大学专业体育的开始,并带领美国专

业体育走上了以私立师范学校为主的发展道路。直到20世纪后,这种模式才随着大量综合性大学体育系(科)的出现逐渐消失。

最后是系统化课外体育体系的形成,具体包括课余体育训练和校内与校际竞技运动两种形式。单项管理协会制度的出现,使校内和校际竞技运动走上组织化发展的道路。第1个由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组成的体育协会成立于1882年的哈佛大学。该协会促成了1883年12月在纽约召开的全美大学校际运动会议,标志着学校管理者与学生联合管理校际运动的开始。系统化课外体育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组织化的课余体育训练。1860年代,希区柯克博士创建了以帮助学生学习压力为目的的课余体操训练,这种(希区柯克)模式在1880年代成为许多大学体育体系的组成部分^[140]。

1.2 美国大学体育形成期的特征

科学化是这一时期大学体育变革的首要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体测量与评价方法的开创和广泛使用。在希区柯克和沙金特的引导下,人们开始用具体数据来反映体质健康水平和基本的运动能力,对身体机能的认识、理解从经验上升到科学层面。二是学校体育开始按照科学学科发展的范式,向体系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例如体育专业培养模式趋向统一;“体育促进会”(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美国体育观点》(American Physical Education Review)等专业体育组织和刊物相继成立出版;体育课的内容和教学法开始受到普遍的关注。这些事实无不渗透着科学化发展的诉求。但遗憾的是,希区柯克、沙金特等学者的科学化思想缺少显著的价值性和方向性:他们在发展体质健康,促进学校体育发展的同时,却忽略甚至否定了体育在社会层面上的教育价值,以及体育运动在人与社会之间的地位与功能,仅仅把体育的价值局限在个体的体质健康层面。

第2个特征是多样化。19世纪下半叶,美国大学体育存在多个实施体系。如“德式-美国”体操、德尔萨特体操、柔软体操、重体操、新体操等。这对美国大学体育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产生了消极和积极影响:在消极一面,多样化使大学体育在内容选择与实施过程中陷入一片混乱,当时的著名学者包依金^[2](J C Boykin)对此的评价是:“美国体育发展的历史表明,体育界最危险的事情不是教师的不称职和人们的漠不关心,而是各种体系与方法之间的无休止的争论。”在积极的一面,多样性使美国大学体育的改革方向保持着最大的可能性与活力,各种学说都能从理念和观点的不断碰撞中得以发展、进化,继而为美国体育思想的整体跨越奠定了基础。

第3个特征是宗教性的弱化。首先体现在宏观社会层面,基于南北统一带来的民族主义的形成、民主政治思想的推广以及工业与科学的迅速发展,“美国高等教育于19世纪末在整体上出现了显著的非宗教趋势”^[139],同时,一些教会和宗教团体在19世纪末纷纷转变对体育的态度,例如基督教刊物《时代精神》曾在1856年公开呼吁:“宗教要承认并限制他们(sports),但也要用神圣的约束来保护他们,使他们纯洁、健康继而有益于人生的伟大目标。”^[3]其次体现在大学体育的具体实施推广层面,19世纪末,基督教青年会(YMCA)是对大学体育推广贡献最大的宗教组织。一方面,青年会积极创办各种体育运动推广活动,如设立体育课程、开办体育场馆、成立北美协会运动联合会,为现代竞技运动在高等教育机构中的推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青年会以简洁的“body, mind, spirit”全面发展理念取代繁琐、刻板的基督教教义作为新的核心理念,削弱了青年会的宗教色彩。这种与时代主流相融合的做法不但受到了广大美国青年的支持,也从实践层面弱化了大学体育的宗教色彩。

2 美国大学体育本土化阶段(1889—1955年)

2.1 美国大学体育体系的本土化

首先是大学体育目标的本土化。以威廉姆斯为代表的“新体育”学者依据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理论^[4],认为“体育与其说是关于身体的教育,倒不如说体育是通过身体的教育(Physical education is education through the physical, rather than education of the physical)。”^[5]在这种思想的推动下,美国大学体育主任委员会(Society Directors Phys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于1920年将大学体育的首要目标从增强体质改变为“培养服从、谦让、自我牺牲、合作、友善、公平以及具备运动道德的青年”^[6]。

其次是大学体育形式的本土化。1922年,赫瑟林顿在其著作《学校体育教育的课程计划》中指出:“德式和瑞典体操对美国体育虽有贡献,但这种欧陆体操终究无法在民主自治的美国社会中生长。”^[7]较之赫瑟林顿的全盘否定,威廉姆斯站在了更高层面,肯定了体操教学形式的优点:“无论我们如何批判形式化体操,都不能忘记它在教学方法上的发展是它的诸多优点之一。从事形式化体操教学的教师知道体育教学如何开始、如何进行、如何结束以及如何对学生的表现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教育模式中,这都是不可或缺的价值。”^[8]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新体育”学者推崇的自然体育克服了形式上过于散漫的弊病,实现了美国大学体育形式上的

本土化改造。

最后是大学体育内容的本土化改造。古利克在1890年接任春田学院的体育指导者之后,以田径和球类运动取代体操作为体育的主要内容。这个创举不但推动了风靡全美的校际竞技运动,也使美国大学体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根据美国大学校内竞技与娱乐促进委员会的资料记载,1913—1914年期间,有半数以上的大学生没有经常进行体育锻炼^[9],但诺顿(Norton)在1928年的调查显示:“大学生的课外活动参加率达到了51%~91%,同时,学校为学生提供的课外体育活动项目平均已经达到10~14个。”^[10]

2.2 美国大学体育本土化的特征

首先是“美国化”的根本诉求。作为一个以移民为主的联邦制国家,美国的民族主义在很长时间里处于一种松散的隐性状态。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激发了美国民众的民族主义。在民族主义的冲击下,“美国化”自然成为教育的首要任务。新体育学者所宣扬的公民教育或社会化教育,在本质上都是对美国青少年的“美国化”教育,是教育本土化在体育领域中的具体实践。基于此,体育的目标从健康转向教育,内容从体操转向竞技,教学从努力转向兴趣。

其次是系统化的哲学基础。在美国大学体育的形成期,希区柯克等学者的理论基础只有卫生学和生理学,而伍德等^[11]新体育学者则为大学体育建构了系统的哲学基础,认为体育在哲学层面与教育是共通的:

“体育与现代教育的目标、方法与内容都是相同的。在目标上都在于给学生提供完整的生活,让学生能在其中发展出有益心理、道德与社会层面的价值观;在形式上都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为主,强调教材设置与教学方法应能相互配合;在内容上应依照学生的愿望来制定,教师仅扮演辅助者的角色,基于学生的兴趣,不断对课程内容做适当的调整。”

最后是运动竞赛的法制化。为了保证“美国化”学校体育制度的实施与推广,各种形式的体育立法蔚然成风。1900年以前,全美只有5个州设置了体育法,1949年,有41个州设置了体育法^[1485]。在大学体育中,针对体育竞赛中日趋严重的贿赂裁判、收买运动员、故意伤害等问题,全国大学体育联合会(NCAA)也尝试通过法制手段进行改善。最具代表性的是1948年通过的“明智法典(Sanity Code)”,详细阐述了大学体育竞赛参与者应当遵守的法规准则。

3 美国大学体育多元化阶段(1955年至今)

3.1 美国大学体育体系的多元化

首先是公共体育方面,包括教学目标和内容的多

元化。青年体格健全委员会成立后,大学公共体育的目标从单一的社会化教育扩展为社会化教育与增强体质二者并重;20世纪50年代起,大学体育目标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方向——运动教育,目标是“通过运动提高学生对于空间、时间、力和质能(mass-energy)关系的理解与控制能力,使学生具备欣赏体育比赛的能力;成为明智的体育器材消费者;了解运动与身心健康的关系”^[12]。在课程内容方面,从1970年代起,个人项目和健身运动也逐渐成为大学公共体育的主要内容之一。Trimble和Hensley在1995年的研究证明:“1970年至1995年期间,在2/3(733所)的大学中,健身运动是增幅最大的运动项目。在42%(462所)的大学中,团队运动是降幅最快的项目,这与个人运动的流行不谋而合”^[13]。

其次是在专业体育方面,主要表现为学科模式与研究领域的多元化。在《费希尔法案》(Fisher Bill)的影响下,美国大学专业体育出现明显的学术化发展诉求,在学科模式上逐渐由单一的师资培训模式分化为3种模式:一是传统的体育师资培训模式,目标是培养一般的体育教师,如春田学院等;二是体育专业化研究模式,以生理、解剖、训练等人体科学研究为主,如波士顿大学、西北大学等;三是既培养一般体育教师,也培养体育科研人员模式,如爱荷华州立大学和威斯康星州立大学。

最后是校际竞技运动方面。一直以来,美国大学校际竞技运动始终由NCAA等民间协会自治,但自20世纪50年代起,政府与国家意志逐渐成为影响其变革的主要力量。例如在性别歧视问题上,影响最大的是联邦教育法案第9条款的颁布。“在第9条款通过前的1971年,美国参加大学校际体育竞赛的男女比例几乎是6:1(男生有170 000人,女生只有30 000人),每所大学平均只有2.5个女子运动队;但在2002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变成了4:3(男生209 000人,女生151 000人)和8.25”^[14]。相比之下,NCAA在校际竞赛改革方面的能力引起了学者和相关机构的广泛批评,著名的TDG(The Drake Group)组织曾明确表示:“美国大学校际竞技运动改革不可能通过NCAA来实现,因为它才是最需要改革的对象。”^[15]

3.2 美国大学体育多元化的特征

首先是反复化。公共体育方面,20世纪50到60年代期间,教学目标以体质健康为主、课程内容以个人健身运动为主,20世纪60至70年代期间,教学目标以运动教育为主、课程内容逐渐偏重团队运动,但70年代后,教学目标再次转向体质健康,而课程内容也随之再次偏向个人运动。专业体育方面,20世纪50

年代起,随着“新体质派”与“学术派”学说的兴起,体育逐渐从职业教育转向学术研究,80年代前后,体育专业出现了职业化教育的倾向,但进入90年代后,职前教育专业受到大幅度消减,以健康类专业为主的研究再次成为主流。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大学体育的上述反复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性发展,而是一种震荡式发展和螺旋上升的态势。例如在公共体育方面,50年代的个人体育强调的是个人的体质健康和运动技能的掌握,而80年代后的个人体育则强调通过体育运动来实现改进生活方式、完成自我实现的目标。在专业体育方面,与90年代的学科与专业设置相比,70年代的专业体育不论在学科设置还是在专业数量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不足。

其次是政府化。一直以来,管理上的充分自治和学术上的高度自由都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主要特征。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大学体育的一些变革中表现出明显的政府化特征。例如在政府机构——青年体格健全委员会(President's Conference Council on Physical Fitness)的引导下,对体质健康的强调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便取代新体育强调的社会化教育,成为以美国卫生、体育和娱乐联合会(AAHPER)为代表的美国体育组织和学者的共识,甚至没有任何的争论。此外,美国大学体育的政府化还体现在国家通过财政手段实现对大学体育的影响。例如,第9条款所制定的政策和措施之所以能得以实施,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通过对联邦财政支持的控制,规定如果不执行第9条款某些政策的学校,则必须放弃获得联邦资助的权利。

通过对美国大学体育历史沿革的梳理可以看出,在美国社会结构与生产力变革的宏观背景下,体育思想的转变不仅为大学体育变革提供前提和基础,还为变革的成功推广提供了指导和规约,是大学体育变革真正的动力来源。从工具价值到本体价值的演变是美国大学体育发展的整体趋势:在美国大学体育的形成期,体育被视为达到体质健康的工具;进入本土化期,体育成为实现公民教育的工具。但进入多元化阶段后,学者们则是在保持工具理性的同时,开始对体育的本体价值进行探寻。

参考文献:

- [1] Van Dalen D B. A world history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ltural, philosophical, comparative[M]. California: Prentice-Hall, Inc, 1971.
- [2] James C Boykin. History of physical education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 of Education for 1891-1892[R]. Washington, D C: USA.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94: 254.
- [3] Editorial. The necessity of recreation[J]. Sport of Time, 1856(12): 546.
- [4] Clark Hetherington. Education is neither for body nor for mind alone, but for all human powers that depend on educational activities for development[J]. Fundamental Education Journal of Proceeding and Addresses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1910(48): 350.
- [5] Jess F Williams, Clifford L Brownell. The administration of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M]. Philadelphia: W B Saunders Company, 1947: 25.
- [6] The aims and scope of physical education[J]. American Physical Education Review, 1920(6): 259-260.
- [7] Hackensmith C W. 西洋体育史[M]. 周恃天,译. 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71: 512.
- [8] Bonnie Cotteral, Donnie Cotteral. The teaching of stunts and tumbling[M]. New York: A S Barnes and CoInc, 1936: 12.
- [9] Wingert H Shindle.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encouragement of intra-collegiate and recreational sports[J]. American Physical Education Review, 1914(5): 368.
- [10] 梅根悟. 新体育—理论—实践——世界教育史大系(31)[M]. 东京: 株式讲谈社, 1975: 452.
- [11] Wood T D, Cassidy R F. The new physical education[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7: 60-62.
- [12] Hensley L D. Current status of basic instruction programs in physical education at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J]. The Journal of Physical Education, Recreation & Dance, 2000(9): 34.
- [13] William H Freeman. Physical education, exercise and sport science in a Changing Society(Seventh Edition)[M]. Sudbury: Jones & Bartlett Learning, 2011: 45.
- [14] 第九条款对竞技运动的影响[N/OL]. http://en.wikipedia.org/wiki/Title_IX#Commission_on_Opportunity_in_Athletics, 2012-05-08.
- [15] TDG 的目标[N/OL]. http://www.thedrakegroup.org/The_Drake_Group_Proposals, 2012-06-05.